孔子在我国编辑史上的开拓性地位和贡献

马鸿盛

摘 要 有关孔子的学术研究甚为丰富，但近年来才涉及他在编辑学方面建树的研究，然而还很不深入。其实，孔子在编辑学领域的成就与贡献也是异常卓著的：他不但以丰硕的编辑成果享誉于世，而且在编辑理论方面的见解和主张也甚为精辟深邃。他是我国编辑事业杰出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关键词 孔子 编辑史 “六经” 述而不作 隐寓褒贬 多闻阙疑 排斥虚妄

一些论著和工具书在对孔子进行评介时大都指出：孔子是我国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这些著述在对孔子生平、事迹和学说介绍时，很少提及他在编辑学方面的建树。其实，孔子在编辑学方面的成就与贡献也是巨大的。他在编辑、整理我国上古文献方面的功勋卓著，不但为人们留下了大量丰硕的编辑成果，而且提出了甚为成熟的编辑理论，并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孔子在我国编辑史上的地位是不应被忽视的。他是我国编辑事业杰出的奠基人，我国编辑史上具有开拓性地位和贡献的古代编辑家。

我国编辑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直接反映孔子思想、学说并传之后世的“著作”只有一部，这就是世人皆知的《论语》。然而《论语》并非孔子本人的“作品”，它是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共同编辑、整理的。实际上，它只是一部孔子的“言行录”或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对话集”。后人能看到的孔子生前自己劳动的作品成果，则要算是由他编辑、整理的“六经”了。因此，我们对“六经”的研究，不但能加深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了解，增强对孔子思想学说的认识，同时也能进一步洞察到孔子在对我国古代文献编辑、整理方面的业绩与贡献。

虽然说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但是，孔子对“六经”来说，主要是“编”而不是“著”；是“述”而不是“作”。因此，“六经”并不是孔子的论著成果，而只是他的编辑成果。所以，从这一角度来看，孔子对我国文化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对“六经”的编辑和整理，而非著作。有的学者将古代书籍的写作分为“著作”、“编述”和“钞纂”三大类，并指出：“‘著作’，是专就创造性的写作说的”；“‘编述’，是在许多可以凭借的资料基础上，加以提炼制作的功夫，用新的义例，改编为另一种形式的书籍出现”；而

“钞纂”则是“排比资料，纂辑成编的意思”[1]。按照上述分类，“六经”理应属于后两种，而并非前者。孔子对“六经”的编辑、整理、修订、纂辑等工作，不但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上古文献，还在文献编辑和编辑学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为我国的编辑事业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我国现存最早的文献典籍《尚书》中已有“维殷先人，有典有册，殷革夏命”的记载(《尚书•多士》)。这就是说，早在殷商时期，就已经有了人们编辑记载“殷革夏命”的“典册”了。另外，在《国语•鲁语下》中，也有“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的记录。意思是孔子的七世祖正考父已征集到“商颂”十二篇，并与周太师共同商议编辑，决定以《那》为各篇之首。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早在孔子之前已经有了较为正规编辑工作了。

但是，由于历史的久远、时代的变迁等原因，这些“典册”以及“商之名颂十二篇”等编辑成果却未能流传后世。而今天我们所能见到或了解到的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编辑成果（或接近其时的成果），则是经过孔子直接或间接编辑、整理的“六经”了。这些文献编辑成果，除《乐》早已亡佚外，其他几部则在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并一直流传至今，成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批重要文献汇编。因此，从现在我们能够见到的编辑成果和资料这一角度来看，孔子则是我国编辑史上的开拓者、奠基人。

另外，从规模上看，即使上述记载属实，即孔子之前已经有了编辑工作，但他们的编辑工作也仅限于某一方面，而像孔子这样对文学、艺术、历史、政治、伦理以及哲学等多方面文献进行如此大规模、多方位的编辑整理，在我国还是第一次。如果我们将孔子以前的资料整理叫作“编辑工作”的话，那么孔子则开创了我国的“编辑事业”，并为此后我国的编辑事业开拓了广阔的道路。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完全有理由说，孔子是我国编辑事业的创始人、奠基人。

孔子整理、编辑“六经”，《论语》、《史记》和《汉书》等重要史料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虽然有人提出某些异议，但也未能得到普遍的认同；更不能确认《史记》等的说法为妄说。后人对孔子与“六经”各书的远近关系有着不同的看法：古文经学家认为“六经皆史”，孔子只是对“六经”作了整理、编校等工作；今文经学家则认为“六经”都是孔子本人的著作，而多数学者更赞同古文经学家的观点。但不管怎样，孔子与“六经”有着直接、间接的编纂关系，却是公认的。虽然孔子与“六经”的远近、深浅关系须分别加以探讨；但是，孔子对“六经”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编辑、整理确是不容置疑的。孔子对“六经”的编辑与整理，不仅是我国编辑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国文化史上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我国上古时期浩瀚的古典文献所作的大规模、全面的审阅、整理与编辑。孔子编辑“六经”，牢固地确立了他作为我国编辑事业开拓者和奠基人不可动摇的地位。

硕果累累的编辑成果

孔子对我国古代文献进行全面、大规模的编辑和整理是具有开拓意义的，是前无古人的。他在一生广集资料的基础上，晚年将全身心投入到这一工作及其教学中来。“六经”的编辑、整理是高质量的，成绩斐然，硕果累累：

《书》即《尚书》，又称《书经》，“尚书”意即上古之书的意思。它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孔子从上千篇（一说三千余篇）上古文献中，“芟夷烦乱，剪裁浮

辞”，得百篇，然后进行分类，并为各篇作序。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指出：孔子“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班固《汉书·艺文志》也指出：“《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尚书》保留了我国商、周等上古时期的一些誓、诰、命、谟等记言材料，其中特别是西周时期的一些重要史料。《尚书》虽有《今文尚书》、《古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之分，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尚书》中已有不少伪作，但它仍不失为人们研究上古史料的一份重要依据。

《诗》，又称《诗经》。它是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500余年间的诗歌305篇（另有有目无诗的“笙诗”6篇）。按风、雅、颂分类，其中，“风”共分十五国风；“雅”又分为大雅、小雅，“颂”又分周颂、鲁颂和商颂。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有人根据《论语》中孔子曾几次提到“诗三百”，认为“孔子删诗说”可能有误，但仍认为孔子曾整理过《诗经》。我认为，两者并不矛盾，“删诗者”就不能谈到自己“所删之诗”了吗？即使孔子对《诗经》只是整理过，整理的过程其实也就是编辑的过程，孔子对《诗经》作了编辑工作，也是顺理成章的。

《春秋》是我国的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它原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史书，即《鲁春秋》，后经孔子编辑、修订、整理，隐寓褒贬，“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笔则笔，削则削”（《史记·孔子世家》），成为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著作。司马迁《报任安书》说“仲尼厄而作《春秋》”。清代袁谷芳《春秋书法论》也指出：“《春秋》者，鲁史也。鲁史氏书之，孔子录而藏之，以传信于后世也。”《春秋》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春秋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则是在它直接影响、演绎下的成果。

《礼》，即《仪礼》又称《礼经》，为记载礼节仪式之书，汉代又称《士礼》。《史记》、《汉书》都指出它是孔子编定。《礼》又有《仪礼》、《周礼》、《礼记》“三礼”之分，而《周礼》、《礼记》亦与孔子有一定的关系。《礼记·礼运》中所述之“小康、大同”思想，则展现了两千多年以前人们对未来的寄希与宿望。

《乐》即《乐经》，是关于音乐的著述，早已亡佚不传（有人认为“乐”附于“诗”中）。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有：“孔子语鲁太师：‘乐，其可知也，始作，……以成’。”又说：孔子“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儒者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舞诗三百”（《墨子·公孟》）；“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秦伯》），都反映了诗、礼、乐三者之间的紧密关系。

《易》又称《周易》，即《易经》。它原是一部上古占卜的书。《史记·孔子世家》有“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说明了孔子对《易》的喜爱程度和钻研精神。孔子在对《周易》的钻研与教学中，曾对其进行了整理。孔子把《周易》看成一部哲学著作，并未把它当作一部占卜的书。

孔子编辑“六经”是我国历史上对古代文献进行的第一次全面大整理、大总结；工程浩大，内容广泛，工作艰巨；然而业绩辉煌、成果丰厚，影响深远。这一工作不但使我国古代文化资料得以系统化地保存和流传，为后世的编辑工作留下了珍贵的、可资借鉴的第一手成果资料，同时也为我国编辑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尽管由于时代久远等原因，这些作品会有某些失真和走形，但今天它们仍不失为我们研究、了解彼时情况的最直接的材料。

这些文献保存至今，这本身即足以说明了它的生命力和价值，反映了孔子在编辑工作方面不可磨灭的功绩。

深邃精辟的编辑理论

孔子的编辑理论和主张可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述而不作”的客观原则，“隐寓褒贬”的主观意图，“多闻阙疑”的求实精神，“排斥虚妄”的科学态度。

一、“述而不作”的客观原则：

“述而不作”是孔子进行编辑工作的一个原则。孔子主张：“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述”，是陈述；“作”，是创造、创新。“述而不作”，就是要尊重客观史实，尊重原作，不随意对原作加以发挥和创造；而“信而好古”则表现了他对古代文化遗产的尊重。孔子的思想体系趋于保守，但体现在编辑原则方面则是尊重客观事实。《论语•子罕》中说：“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即：不随意主观臆测；不作必然的武断结论；不固执成见定论；不自以为是，不以个人的好恶定是非。他又提出：“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论语•卫灵公》），只要是合理的，都可以兼容并蓄。孔子的这些谈论都是对“述而不作”的说明与补充。他的这些主张无疑都是较为客观、合理的编辑思想与原则。

孔子编纂《春秋》是以鲁史为蓝本进行的。孔子编辑“六经”，也只是他依据所掌握的文献资料对其进行审定、筛选、校勘等工作而已。《汉书•儒林传》曾说：孔子编辑“六经”：“究观古今之篇籍，于是，叙《书》则断《尧典》，称《乐》则法《韶舞》，论《诗》则首《周南》，缀周之《礼》，因鲁《春秋》，……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言夫子所述六艺事也。”这也说明了孔子在整理“六经”时所遵循的“述而不作”的客观编辑原则。他编辑、整理的作品，既注意代表性，又注重广泛性。例如，《诗经》既有“大雅”等贵族之作；又有“十五国风”等以平民为主要作者的作品。孔子曾多次斥责“郑声淫”，主张“放郑声”（《论语•卫灵公》），即舍弃郑国的音乐。但是，他仍将郑国的诗歌收入《诗经》中来。这些都体现了他的“述而不作”以及“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客观编辑原则。

自孔子以后，学术编辑，尤其是经书编辑一直将“述而不作”当作一个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司马迁在编定《史记》时说：“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可见司马迁对孔子“述而不作”原则的遵循与继承。

二、“隐寓褒贬”的主观意图：

孔子又主张，要在尊重客观的前提下“隐寓褒贬”。也就是说，编辑人员不是通过自己的直接阐述来表达看法和意见，而要将作者的主观意图隐寓于整理、编纂的过程中。虽然孔子主张“述而不作”，但是“述”中却隐寓了褒贬。这就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孔子公开地阐明其选辑《诗经》的主观意图是“取其可施于礼仪”者；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他还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这些是他选编《诗经》的标准和出发点。后人在评价某一著作的写法时，常称某书为“春秋笔法”，其实也就是指该书有“隐寓褒贬”之意。《庄子•天运篇》说：“《诗》以道志，《书》以道文，《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义。”清楚地说明了“六经”编辑工作的主观意图和客观效果。

孔子不但认为文献编辑可以隐寓褒贬，起到“兴、观、群、怨”的作用，甚至还将其看成参政的一个途径。例如，《论语•为政》中载，有人问孔子“子奚不为政?”孔

子回答：“《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他认为通过编纂《书》等文献，也能达到阐发自己思想政见的目的。《论语•微子》中有：桀溺曾通过子路对孔子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像洪水一样的坏现象到处都是，谁能去改变它呢?)孔子说：“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天下如果公正，我就不用去改变它了。)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仲尼厄而作《春秋》”，即指孔子因为困厄不得志，但他隐寓褒贬，并以此影响世人，所以才编辑成名垂史册的我国第一部编年史书。

绝对的客观是不存在的，客观与主观是相对而言的。鲁迅先生曾说：“选本可以借古人文章寓自己的意见。……读者虽然读古人书，却得到了选者之意”④。范文澜也说：“六经从形式上说是叙述旧文，从整理的准绳和经义的阐明说是创作新意”(四)。其中也道出了“隐寓褒贬”的涵义。

三、“多闻阙疑”的求实精神：

在搜集材料、占有材料和选用材料方面，孔子的主张是“多闻阙疑”和“无征不信”。他说：“吾犹及史之阙文也”(《论语•卫灵公》)，面对这种情况他是如何对待的呢?他提出的主张是：“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多见阙殆，慎行其余”(《论语•为政》)。也就是说：要博学多闻，遇有疑难的问题，仍要加以保留；对自己所了解的部分，也应谨慎地予以阐述。孔子提出的这些见解，无疑反映了他治学，特别是从事文献整理、编辑等方面工作的严谨学风与求实精神。

孔子为编辑《春秋》而广集史料，曾派子夏等人到各地进行征集活动，得“百二十国宝书”(《公羊传疏》)，并在鲁史的基础上修订成《春秋》。他将收集到的大量古代文献和“古诗三千”，“芟夷烦乱，剪裁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孔安国《尚书序》)，分别辑为《尚书》百篇和“诗三百”。

孔子主张的“多闻阙疑”又是指编辑工作必须要注重考证，即“无征不信”。他强调，如果没有翔实可靠的资料，即使自己主观认为是正确的，也不能对其加以编纂或采纳。例如：孔子之所以多谈“周礼”，在《仪礼》一书中又仅为“士礼”，他自己道出了其中的原因。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也”(《论语•八佾》)。虽然他对夏礼、殷礼“能言之”，但他最终没有将它们编辑成书，原因是“文献不足故也”。我们今天阅读《春秋》时会发现，它有多处记事而不记时日，记年而不记日月，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文献不足”。这是他不肯主观臆断、妄下断语所的结果。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孔子“多闻阙疑”、“无征不信”的严谨学风和求实精神。

四、“排斥虚妄”的科学态度：

《论语•述而》中有：“子不语怪、力、乱、神。”即孔子不谈论怪诞、暴力、邪乱、鬼神之类的事情。孔子还提出“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孔子对当时人们无法了解、掌握的一些超自然现象，如鬼神、怪异等不予探讨，或则尽量加以回避，不予提及，“敬鬼神而远之”。鲁迅曾说：“孔丘先生确是伟大，生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俗谈鬼神”¼。在科学还很落后，神话与迷信充斥的社会中，孔子能作到这一点也是甚为难能可贵的。

孔子的上述观点和主张同样表现在他所整理、编辑的作品中。先秦的一些作品中大都充斥着浓厚的神话色彩，就连《墨子》等书中也有不少鬼神故事，然而，在孔子编辑、整理的《春秋》等作品中却几乎见不到鬼神和怪异等巫妄之事。例如，据《公羊传》载，原来的

“鲁春秋”(鲁史)曾有庄公七年时“雨星,不及地尺而复”的记叙,即:陨星如雨般地落下,在距地面一尺左右时是又返回空中。孔子认为该记录事属虚妄,他在修订《春秋》时没有采纳这种说法,而只书为“星陨如雨”。这种讲求科学的精神和态度成为后世史书编纂时争相效仿的典范。

孔子在编辑理论上的建树是颇为丰富的,他的一些主张即使今天看来也是可取的或值得借鉴的。对此,我们应该认真地加以探讨和研究,有选择地加以继承和借鉴。

深远广泛的历史影响

孔子编辑“六经”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为我国编辑事业的形成和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不但以丰厚的编辑成果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典范,还以其深邃的编辑思想和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述而不作,隐寓褒贬,多闻阙疑,无征不信以及排斥虚妄等的编辑原则和思想一直影响并指导着后世的编辑工作。

他首创了书籍的多种体裁:《书》为我国第一部文献汇编;《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春秋》为我国第一部史学名著;《礼》、《乐》、《易》则分别在仪礼、音乐以及哲学等方面均处于领先的地位,为后世各类书籍的编辑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他所编辑的《春秋》首创编年体史书体例,开创了我国编年体史书的先河,按年、季、月、日编排的顺序,以年系季,以季系月,以月系日。这种体例一直影响着后世的史书编辑工作;其后世的史学名著《资治通鉴》即渊源于此。章学诚在《校雠通义·宗刘编》中说:“二十三史,皆《春秋》家学也”,可见其影响之深远。孔子编纂《尚书》,在各篇前“为之序,言其作意”(班固《汉书·艺文志》),首创为书作“序”的先例。其后至今,人们写书时往往在书前加写序言,其始则源出于孔子。《诗经》中“风、雅、颂”,“赋、比、兴”“六义”的分类方法也甚为合理。它分别按内容(地域、来源)和写法分类,为后世编辑学分类方法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依据。“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史记·孔子世家》),可见孔子观点方法及编辑思想和理论的深远历史影响。

孔子在我国编辑史上具有开拓性的地位和贡献。他以硕果累累的编辑成果,深邃精辟的编辑理论,对我国编辑事业产生了源远流长的历史影响,他不愧为我国编辑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对于孔子的编辑实践和理论我们应该深入地加以研究和总结,合理地借鉴和继承。

---

[1] 张舜徽:《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9页。

④ 鲁迅:《选本》,《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6页。

㈣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1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8月第4版,第210页。

¼ 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92页。

参考文献

1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及《史记·儒林传序》。

2 中华孔子研究会:《孔子研究论文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11月版。

3 萧汉森、戴志松等:《编辑学概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4月出版。

(责任编辑 匡 四)